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

——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贾志科 罗志华

【摘要】文章利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 0.4~0.5 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青年女性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偏离 地域差异

【作者】贾志科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罗志华(通讯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呈现出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波动态势。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估算结果,2000~2010 年总和生育率的区间估计为 1.45~1.75(王金营、戈艳霞,2013),2010~2020 年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较大波动,其中 2012 和 2017 年分别出现峰值 1.89 和 1.88,2020 年出现最低值 1.3(翟振武等,2022)。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育龄人口生育行为的深刻变化,也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从控制走向包容的转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家庭养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ARK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河北大学吕红平教授在研究中提供的指导与帮助。

变(杨菊华,2022)。近年来,国家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1年)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2022年)等文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力求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到目前为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从2016年的1786万人下跌至2023年的902万人^①,未来人口出生形势不容乐观。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点讨论,相关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关于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情况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各类育龄群体的生育数量整体呈“理想子女数>意愿(打算生育)子女数>实际子女数”的递变趋势(贾志科等,2019;张冲、李想,2020);生育性别结构偏好逐渐由有偏好向无偏好转变,但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的弱化趋势不同步(侯佳伟等,2018);理想初育年龄与实际初育年龄呈现“实际高于理想”的特征(张银锋、侯佳伟,2016);生育间隔经历了从较短(2~3年)到较长(4年以上)再逐渐回归到较短的变化过程(张翠玲等,2019)。二是关于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原因的研究。有研究发现,随着生育政策从严格到宽松,不同区域理想子女数与实际生育子女数的差距均呈扩大趋势(陈卫、靳永爱,2011);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高于实际生育水平的幅度随年龄的减小而增大(王军、王广州,2016);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青年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情况更为突出(龚顺等,2023)。三是关于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影响机理的研究。在宏观层面,育龄妇女总体规模减小、年轻群体的生育推延效应强劲、年长群体的生育补偿效应微弱(顾宝昌等,2020),导致意愿生育水平与实际生育水平出现偏离。从微观层面看,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主要源于婚育观念与行为的转变,以及育儿成本高、照料负担重、生育健康问题突出等(於嘉,2022;罗志华等,2022;茅倬彦、李宁,2023)。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深入和细致,得出了很多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结论。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从单一经济或文化因素展开分析,较少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因素叠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综合影响,且很少使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开展研究。本文基于经济学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的文化视角,构建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理论框架,探讨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从生育数量和性别维度,勾勒出全国青年女性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网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899428.html;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网址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4935.htm。

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全貌,以期深化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现实差距的认识。二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文化观念的双重异质性视角,将不同地区划分为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4种类型,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综合影响。三是通过识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文化观念的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状况的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回顾与基本思路

经济学理论为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提供了重要解释。西方经济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研究基本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将生育选择与人口增长和宏观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二是从微观层面探讨生育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变化与生育水平的关系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保持增长态势,生育率将会下降到较低水平(Becker, 1992),这已被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走势所证实。然而,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并不总是负相关关系,相关的制度变革可能会将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负向影响逆转为正向(Luci-Greulich等, 2014)。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薛珑等, 2023)。新家庭经济学理论主要从微观生育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解释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该理论认为,家庭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生育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生育子女的成本高于其边际收益时会抑制家庭生育行为,反之则会刺激生育行为(Becker等, 1988)。相关经验研究表明,生育的直接成本(如教育、医疗、住房及日常生活等费用)与间接成本(如时间、机会、心理等成本)会强化育龄群体“想生不敢生”的顾虑(郑真真等, 2009;袁益、张力, 2021;罗志华等, 2022),而生育带来的收益如精神慰藉、养老保障等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实现(Leibenstein, 1975)。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收益却持续下降(赵伟锋等, 2017),生育成本与收益的这种非均衡发展(夏志强、杨再苹, 2019),最终导致了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Caldwell, 1976),人口转变结束时生育率的下降会止步于更替水平,此后人口将保持稳定(Lee, 2002)。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国家的生育率在更替水平附近开始了新一轮的下降,而后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对此已然无法解释,一些学者提出了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代表的文化视角的解释(Van de Kaa, 1987; Lesthaeghe, 2010)。“第二次人口转变”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即从利他主义到个人主义规范和价值观念转变的作用

(Zaidi 等, 2017), 也即, 与家庭及生育相关的社会规范与期望等文化因素转向, 推动了生育率下降 (Van de Kaa, 2001)。研究发现, 相较于家庭层面的因素, 文化层面的因素对美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更大 (Fernández 等, 2006; Marcén 等, 2018); 中国婚育文化观念中的两种“文化堕距”, 即“性别平等困境”和“文化冲突困境”, 也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水平与意愿的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陈佳鞠, 2021)。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 中国育龄群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如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不生育倾向增加、对女性生育必要性认同度下降、女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扩大等 (田宏杰等, 2022; 於嘉, 2022; 陈蓉, 2023), 这些变化加剧了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此外, 在以孩子为中心向以夫妻为中心的家庭文化转变过程中, 夫妻双方生育意愿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 并且呈现出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显著负向作用 (乐菡、杨昕, 2023)。

有研究认为, 人口变化研究的两个相关阶段 (即宏观层面的“发现”和微观层面的“解释”) 具有迭代互动关系, 对人口变化的解释必须“植根于个人、夫妇和家庭的行为及互动模式, 并将其嵌入宏观背景中” (Billari, 2015)。在中国“放开三孩”的生育政策背景下, 经济限制可能与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 (Kane 等, 2023), 因而在开展相关研究时需要同时强调政策、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存在较大差异, 生育水平也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 (刘卓、王学义, 2021)。然而, 目前学界对于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研究相对较少, 关于中国不同区域间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情况及其成因还缺乏定量测量和科学分析。因此, 本文基于经济学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文化视角, 系统考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经济与文化原因, 以期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分化特征提供参考。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组织实施的“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样本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对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时居住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 15~60 岁中国籍女性人口进行调查, 最终获取样本规模约 25 万人 (庄亚儿等, 2018)。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第一, 鉴于本文关注的研究对象是育龄女性中的青年群体, 将年龄限定在 18~35 岁; 第二, 由于中国社会“普婚普育”的期望仍然存在, 非婚生育等非传统生育行为并未明显增多 (於嘉, 2022), 再加上已婚青年的生育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 研究该群体的现实价值更为明显, 因而本研究重点关注已婚群体; 第三, 基于



样本有效性的考虑,剔除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调查地域等关键变量缺失、无回答等情况的被访对象。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 54 719 名被访者的数据。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 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生育意愿与行为,通过以下 4 个维度进行测量,即数量、性别、数量偏离和性别偏离;主要解释变量为“经济—文化”区域,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结合的指标来测量。

其中,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维度包括理想子女数、打算生育子女数、曾生子女数和现有子女数。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询问被访者“您认为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您打算生几个孩子”“截至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时,您一共曾生几个孩子”“您现有几个孩子(包括收养的,不包括送养及下落不明的,不含现孕)”分别测量其理想子女数、打算生育子女数、曾生子女数和现有子女数。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性别维度主要包括理想子女的性别结构、打算生育的子女性别结构、曾生子女性别结构及现有子女性别结构。在理想子女数、打算生育子女数、曾生子女数及现有子女数基础上,问卷还进一步询问了被访者在生育“几个男孩,几个女孩”问

表 1 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青年女性构成的基本情况(N=54719)

变 量	人数	占比(%)	变 量	人数	占比(%)
城乡类型			工作类型		
城镇	21438	39.18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782	1.43
乡村	33281	60.82	专业技术人员	4251	7.77
年龄			办事人员	3887	7.10
18~23 岁	3082	5.63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10552	19.28
24~29 岁	20915	38.22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9725	17.77
30~35 岁	30722	56.1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3345	6.11
受教育程度			家庭主妇等其他人员	22177	40.53
小学及以下	7081	12.94	收入水平		
初中	24002	43.86	负或无收入	23019	42.07
高中或中专	10009	18.29	低收入	9524	17.41
大专	7122	13.02	中收入	12236	22.36
本科及以上	6505	11.89	高收入	9940	18.17
民族			婚姻状态		
汉族	47586	86.96	初婚	52082	95.18
少数民族	7133	13.04	再婚	1569	2.87
流动状态			其他	1068	1.95
非流动人口	47323	86.48			
流动人口	7396	13.52			

注:其他包括未婚同居、离婚同居和丧偶同居。

题上的期望与实际情况。在理想和打算生育子女性别结构方面,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划分为男孩偏好(男孩数量>女孩数量)、女孩偏好(男孩数量<女孩数量)、无偏好(男孩数量=女孩数量)和不要孩子(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均为 0)4 类;在曾生和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方面,根据被访者的回答细分为男孩多(男孩数量>女孩数量)、女孩多(男孩数量<女孩数

量)、无偏(男孩数量 = 女孩数量)和从未生过 / 无孩子(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均为 0) 4 类。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和性别偏离维度,主要指理想 / 打算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行为在数量和性别方面的差距,据此可以全面理解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状况。在数量偏离维度,用理想 / 打算生育子女数减去现有子女数的差值表示生育数量意愿与行为的偏离情况,将差值为正、为 0 和为负分别记为理想 / 打算生育子女数高于、等于和低于现有子女数。在性别偏离维度,将理想 / 打算生育性别结构与现有子女性别结构进行对比,结果分为已满足与未满足两类。

“经济—文化”区域变量主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同时结合自然地理情况,具体操作方法是:根据 2017 年全国人均 GDP(59 660 元)和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打算生育子女数均值(1.89 个),利用象限图对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进行划分,分为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 4 类。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之所以采用人均 GDP 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划分“经济—文化”区域类型,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均 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与生育率之间高度相关(Furuoka, 2010; Luci-Greulich 等, 2014);另一方面,打算生育子女数作为更趋近于人们真实生育意愿的关键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生育文化或生育制度的特点(Hagewen 等, 2005; Fernández 等, 2009)。生育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但囿于理论认识和指标获取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能够综合反映生育文化的指标体系。因此,本文分别以打算生育子女数量和现有子女数量反映生育数量文化,用打算生育子女性别结构和现有子女性别结构反映生育性别文化。尽管这样的处理可能会存在不够科学或准确的问题,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区生育文化的大致特征。

(三) 分析方法

为了全面了解和把握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和行为偏离的基本情况,本文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分析与回归统计分析方法对不同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包括:一方面,采用方差分析和列联表分析对不同区域青年女性在数量和性别层面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在总体上把握中国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基本状况和区域分化情况;另一方面,采用线性回归和二元 logit 回归方法,分组考察青年女性打算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行为在数量和性别方面偏离的影响因素,识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文化背景下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奠定基础。

四、主要分析结果

(一)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总体状况

表2和表3分别报告了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及其偏离的总体情况。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女性的生育数量均值呈“理想子女数(1.99)>打算生育子女数(1.89)>曾生子女数(1.47)>现有子女数(1.45)”的递变趋势;在性别方面,理想生育子女性别结构表现为“无偏好(77.55%)>女孩偏好(12.72%)>男孩偏好(9.57%)>不要孩子(0.16%)”,打算生育的子女性别结构则呈现出“无偏好(49.08%)>男孩偏好(26.95%)>女孩偏好(23.71%)>不要孩子(0.26%)”的特征,曾生子女性别结构和现有子女性别结构均存在“男孩多>女孩多>无偏>无孩”的特点(见表2)。

从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和性别偏离状况看,在数量方面,理想或打算生育子女数比现有子女数多0.4~0.5个,理想子女数大于现有子女数的比例接近一半(49.90%),打算生育子女数大于现有子女数的比例也多37.5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实现上尚有较大空间;在性别方面,六成以上的青年女性理想生育子女性别结构未得到满足,打算生育子女性别结构未得到满足的比例也达三成以上(见表3)。由此可见,青年女性在生育数量上的偏离以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而性别维度的偏

离主要表现为现有子女性别结构尚未满足理想或打算的性别结构,尤其是距离理想状态的空间更大。这与以往调查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宋健、陈芳,2010;贾志科等,2019)。

(二) 基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域分布

图给出了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划分的“经济—文化”区域类型分布情况。如前所述,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划分出四种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类型。位于第一象限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表2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总体比较情况(N=54719)

类别/属性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理想情况	打算情况	曾生情况	现有情况
生育数量(个)				
平均生育子女数	1.99	1.89	1.47	1.45
生育性别(%)				
无偏好/无偏	77.55	49.08	22.71	22.83
男孩偏好/男孩多	9.57	26.95	38.06	37.84
女孩偏好/女孩多	12.72	23.71	31.87	31.82
不要孩子/无孩	0.16	0.26	7.36	7.51

表3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总体比较情况(N=54719)

类别/属性	均值/比例	类别/属性	均值/比例
生育数量偏离程度		生育数量偏离程度	
理想与现有差值(个)	0.53	打算与现有差值(个)	0.44
理想>现有(%)	49.90	打算>现有(%)	37.59
理想=现有(%)	46.14	打算=现有(%)	61.84
理想<现有(%)	3.96	打算<现有(%)	0.57
生育性别偏离程度		生育性别偏离程度	
现有已满足理想(%)	37.39	现有已满足打算(%)	67.33
现有未满足理想(%)	62.61	现有未满足打算(%)	32.67

人均收入在全国位居前列,但传统生育文化观念较强,如福建多元化的生育习俗、广东浓郁的宗族观念以及山东“多子多福”的儒家文化传统。因此,这类地区育龄群体的生育文化认同多元,生育观念较为积极。位于第二象限的省份人均 GDP 处于中等或较低水平,且传统生育文化观念较强。位于第三象限的省份人均 GDP 处于较低水平,但生育率下降较早且近年来下降速度较快,总和生育率较低。位于第四象限的省份人均 GDP 处于较高水平,但低生育欲望和高育儿成本等因素制约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总和生育率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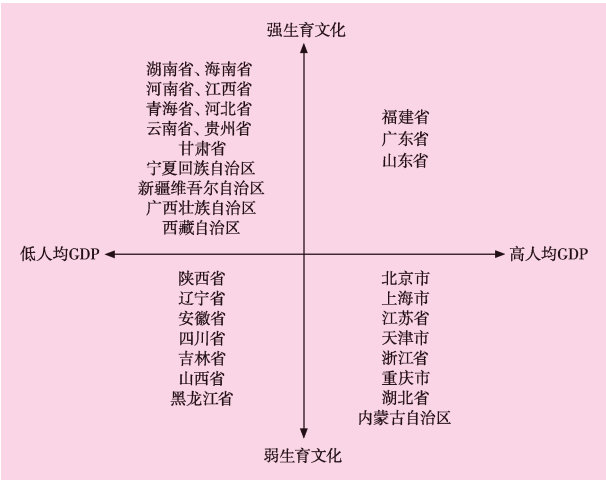


图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文化观念划分的“经济—文化”区域类型

（三）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

就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数量和性别维度的偏离情况而言(见表 4),在理想与现有的数量对比方面,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 3 类区域均为“理想 > 现有”的比例最高,只有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理想 = 现有”的比例最高,这反映出 4 类区域理想生育状态的不同实现程度。

在打算与现有的数量对比方面,4 类区域均呈现出“打算 = 现有”的比例最高的特点,但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两类区域“打算 > 现有”

表 4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N=54719) 单位: %

类别 / 属性	高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高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统计检验
生育数量偏离程度					
理想 > 现有	49.47	56.21	45.22	51.70	$\chi^2=749.42^{***}$
理想 = 现有	47.13	41.74	48.60	45.83	
理想 < 现有	3.40	2.05	6.18	2.47	
打算 > 现有	42.16	36.09	38.76	33.85	$\chi^2=191.58^{***}$
打算 = 现有	57.22	63.47	60.53	65.72	
打算 < 现有	0.63	0.44	0.71	0.43	
生育性别偏离程度					
现有已满足理想	63.45	65.99	60.36	62.35	$\chi^2=112.83^{***}$
现有未满足理想	36.55	34.01	39.64	37.65	
现有已满足打算	63.43	67.16	67.88	69.33	$\chi^2=83.07^{***}$
现有未满足打算	36.57	32.84	32.12	30.67	

注:*** 表示在 0.1%的水平上显著。

的比例相对较高,可见这两类区域尚有较大的生育空间。在生育性别偏离程度上,4类区域较为一致,均有六成以上的被访者已达到满足状态。

(四)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

表5给出了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数量和性别维度偏离状况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情况(即打算生育子女数与现有子女数之差),通过OLS回归模型检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数量维度偏离的影响因素;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的偏离情况(即现有子女性别结构相对于打算生育性别结构的满足程度,满足赋值1,未满足赋值0),通过logit回归模型估计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偏离情况的影响因素。

表5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N=54715)

变 量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性别偏离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城乡类型(乡村=0)	-0.010*(0.006)	-0.007(0.006)	0.045*(0.025)	0.036(0.025)
流动状态(非流动=0)	-0.006(0.008)	-0.004(0.008)	0.011(0.031)	0.009(0.031)
年龄	-0.206*** (0.010)	-0.206*** (0.010)	0.370*** (0.039)	0.374*** (0.039)
年龄平方	0.003*** (0.000)	0.003*** (0.000)	-0.006*** (0.001)	-0.006*** (0.001)
婚姻状况(再婚或其他=0)	-0.167*** (0.016)	-0.168*** (0.015)	0.591*** (0.051)	0.597*** (0.051)
婚姻持续时长	-0.056*** (0.001)	-0.056*** (0.001)	0.224*** (0.005)	0.223*** (0.005)
民族(少数民族=0)	-0.113*** (0.009)	-0.107*** (0.009)	0.183*** (0.032)	0.192*** (0.033)
受教育程度	0.023*** (0.003)	0.025*** (0.003)	-0.124*** (0.012)	-0.132*** (0.012)
工作类型(家庭主妇等其他人员=0)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0.061** (0.024)	-0.060** (0.024)	0.152* (0.090)	0.145 (0.090)
专业技术人员	-0.015 (0.015)	-0.017 (0.015)	0.026 (0.056)	0.027 (0.056)
办事人员	-0.038** (0.015)	-0.033* (0.015)	0.104* (0.056)	0.091 (0.056)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0.035** (0.011)	-0.034** (0.011)	0.094* (0.046)	0.088* (0.046)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0.011 (0.011)	-0.012 (0.011)	0.172*** (0.048)	0.171*** (0.048)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071*** (0.013)	-0.068*** (0.013)	0.219*** (0.057)	0.214*** (0.058)
收入水平(负收入或无收入=0)				
低收入	0.092*** (0.011)	0.089*** (0.011)	-0.254*** (0.048)	-0.248*** (0.048)
中收入	0.121*** (0.011)	0.118*** (0.011)	-0.495*** (0.045)	-0.487*** (0.045)
高收入	0.104*** (0.012)	0.108*** (0.012)	-0.364*** (0.049)	-0.375*** (0.049)
“经济—文化”区域(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0)				
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		0.087*** (0.008)		-0.280*** (0.032)
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		-0.030*** (0.008)		0.158*** (0.030)
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		0.068*** (0.008)		-0.193*** (0.033)
常数项	4.168*** (0.148)	4.207*** (0.148)	-6.791*** (0.546)	-7.007*** (0.549)
R-squared/Pseudo R-squared	0.1842	0.1863	0.1451	0.1462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0.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

回归结果表明,模型 1 和模型 3 在不加入“经济—文化”区域变量的情况下,城乡类型、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和性别偏离有显著影响。模型 2 和模型 4 在纳入“经济—文化”区域变量后,城乡类型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其他变量的影响仍相对稳定。

从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数量偏离的影响来看,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数量偏离的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对于参照组(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程度分别扩大了 9.09% ($=e^{0.087}-1$) 和 7.04% ($=e^{0.068}-1$),而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程度则减少了 2.96% ($=1-e^{-0.030}$)。

就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偏离的影响而言,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相比于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性别偏好得到满足的概率显著更低,即生育性别结构偏离程度较高;而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性别偏好得到满足的概率更高,即生育性别结构偏离程度较低。

综上,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和性别结构偏离具有重要影响,并且生育文化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对于弱生育文化地区,人均 GDP 的提高会减弱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偏离程度,其背后的原因既可能是生育意愿的降低,也可能是实际生育行为的增加。而在强生育文化地区,无论人均 GDP 是高还是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偏离程度均会增加,这表明生育文化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

(五)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

表 6 报告了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数量维度偏离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的差异。结果发现,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对各“经济—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出现数量偏离具有不同的影响,区域分化特征明显。

在城乡类型方面,相对于乡村,居住在城镇并且属于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差距明显偏低,但城乡类型在其他 3 类区域的生育数量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在流动状态方面,相对于非流动的青年女性,流动可能会降低高人均 GDP 的两类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程度,但对低人均 GDP 的两类区域的生育数量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高收入地区的流动女性生育观念已发生明显转变,理想及打算生育数量较少,与实际子女数差异较小。年龄对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均有负向影响,并且对低人均 GDP—弱

表 6 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生育意愿与行为数量偏离的影响因素差异比较

变 量	高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高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城乡类型(乡村 =0)	0.007(0.016)	-0.028*(0.011)	0.009(0.011)	-0.020(0.013)
流动状态(非流动 =0)	-0.043*(0.018)	-0.020*(0.012)	0.015(0.018)	0.031(0.023)
年龄	-0.209*** (0.029)	-0.184*** (0.023)	-0.211*** (0.016)	-0.232*** (0.022)
年龄平方	0.003*** (0.000)	0.003*** (0.000)	0.003*** (0.000)	0.004*** (0.000)
婚姻状况(再婚或其他 =0)	-0.209*** (0.048)	-0.156*** (0.030)	-0.208*** (0.024)	-0.058*(0.032)
婚姻持续时长	-0.069*** (0.003)	-0.056*** (0.002)	-0.056*** (0.002)	-0.049*** (0.002)
民族(少数民族 =0)	-0.051(0.042)	-0.061** (0.020)	-0.130*** (0.011)	-0.061*(0.025)
受教育程度	0.028** (0.008)	0.015*(0.006)	0.037*** (0.006)	0.017*(0.007)
工作类型(家庭主妇等其他人员 =0)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0.172*(0.079)	-0.050(0.044)	-0.057(0.042)	-0.039(0.047)
专业技术人员	-0.051(0.038)	-0.053*(0.027)	0.005(0.025)	-0.012(0.032)
办事人员	0.007(0.039)	-0.088*** (0.025)	-0.019(0.027)	-0.015(0.033)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0.046(0.030)	-0.058** (0.022)	-0.021(0.018)	-0.026(0.024)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0.050(0.034)	-0.003(0.028)	0.009(0.017)	-0.020(0.02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067*(0.033)	-0.111*** (0.023)	-0.047*(0.024)	-0.038(0.035)
收入水平(负收入或无收入 =0)				
低收入	0.126*** (0.034)	0.062*(0.027)	0.079*** (0.017)	0.091*** (0.023)
中收入	0.179*** (0.029)	0.130*** (0.021)	0.095*** (0.017)	0.090*** (0.024)
高收入	0.174*** (0.031)	0.106*** (0.022)	0.106*** (0.022)	0.098** (0.028)
常数项	4.24*** (0.415)	3.841*** (0.330)	4.218*** (0.221)	4.367*** (0.325)
F	117.06***	155.81***	267.68***	125.96***
样本量	8462	13092	21358	11803
R-squared	0.1979	0.1801	0.1908	0.1776

注：同表 5。

生育文化地区的影响更大。就婚姻状况而言,初婚会降低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数量的差距;婚姻持续时长对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均有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表现比较接近。相对于少数民族,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 3 类区域的汉族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程度较小,尤其是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地区的偏离程度更小。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会扩大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差距。从工作类型看,相对于家庭主妇等人员而言,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仅对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差距具有降低作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仅对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数量偏离有负向影响,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对高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强生育文化 3 类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差距均具有降低作用。从收入水平来看,被访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对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均具有正向影响,相对于负收入或无收入的青年女性,各“经济—文化”区域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数量偏离程度均显著较大。

表 7 不同“经济—文化”区域生育意愿与行为性别偏离的影响因素差异

变 量	高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高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强生育文化	低人均 GDP— 弱生育文化
城乡类型(乡村 =0)	-0.029(0.062)	0.121 ^{**} (0.047)	-0.040(0.043)	0.116 [*] (0.056)
流动状态(非流动 =0)	0.101(0.070)	0.148 ^{**} (0.051)	-0.081(0.061)	-0.148(0.094)
年龄	0.401 ^{***} (0.107)	0.334 ^{***} (0.089)	0.387 ^{***} (0.058)	0.484 ^{***} (0.088)
年龄平方	-0.006 ^{**} (0.002)	-0.005 ^{**} (0.002)	-0.006 ^{***} (0.001)	-0.008 ^{***} (0.002)
婚姻状况(再婚或其他 =0)	0.498 ^{**} (0.147)	0.634 ^{***} (0.106)	0.701 ^{***} (0.076)	0.399 ^{**} (0.117)
婚姻持续时长	0.249 ^{***} (0.012)	0.227 ^{***} (0.010)	0.226 ^{***} (0.007)	0.208 ^{***} (0.010)
民族(少数民族 =0)	0.201(0.157)	0.143 [*] (0.084)	0.295 ^{***} (0.041)	-0.128(0.100)
受教育程度	-0.154 ^{***} (0.030)	-0.047 [*] (0.024)	-0.225 ^{***} (0.020)	-0.066 [*] (0.026)
工作类型(家庭主妇等其他人员 =0)				
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	0.441(0.304)	0.072(0.167)	0.268 [*] (0.153)	0.014(0.183)
专业技术人员	0.116(0.139)	0.219 [*] (0.110)	-0.053(0.091)	-0.123(0.127)
办事人员	-0.055(0.142)	0.301 ^{**} (0.107)	0.029(0.100)	-0.124(0.130)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0.183(0.113)	0.191 [*] (0.096)	0.014(0.072)	0.054(0.105)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0.293 [*] (0.130)	0.006(0.129)	0.123 [*] (0.068)	0.125(0.10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223 [*] (0.128)	0.427 ^{***} (0.109)	0.128(0.103)	0.106(0.151)
收入水平(负收入或无收入 =0)				
低收入	-0.447 ^{**} (0.131)	-0.193(0.126)	-0.206 ^{**} (0.068)	-0.278 ^{**} (0.105)
中收入	-0.759 ^{***} (0.110)	-0.466 ^{***} (0.096)	-0.455 ^{***} (0.070)	-0.291 ^{**} (0.102)
高收入	-0.616 ^{***} (0.119)	-0.382 ^{***} (0.096)	-0.374 ^{***} (0.084)	-0.343 ^{***} (0.117)
常数项	-7.121 ^{***} (1.527)	-6.743 ^{***} (1.276)	-6.782 ^{***} (0.809)	-8.155 ^{***} (1.251)
Log Likelihood	-4740.88 ^{***}	-7192.00 ^{***}	-11160.29 ^{***}	-6276.94 ^{***}
样本量	8462	13092	21358	11803
Pseudo R-squared	0.1469	0.1323	0.1677	0.1373

注:同表 5。

从不同“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偏离的影响因素看(见表 7),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均对不同“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性别偏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显示出区域分化的特征。

在高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和低人均 GDP—弱生育文化区域,城镇青年女性生育

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高于农村,即性别偏离程度相对较低,而其他两类区域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就流动状态而言,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流动青年女性生育性别结构的满足概率高于非流动青年女性,而其他3类区域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对各“经济—文化”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性别结构满足与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4类区域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存在性别偏离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从婚姻状况看,4类区域初婚青年女性的生育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均高于再婚或同居者;婚姻持续时长对4类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性别结构满足与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婚姻持续时间越长,生育性别结构未满足的可能性越小。在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和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两类区域,汉族青年女性比少数民族的生育性别结构满足概率更高,出现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在4类区域,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性别结构偏离的概率越大。相对于家庭主妇等人员,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青年女性生育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更高;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的青年女性生育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更高;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国家机关等单位负责人和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中的青年女性生育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更大;在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工作类型的影响不显著。与负收入或无收入人员相比,青年女性收入的增加将会显著降低生育性别结构满足的概率,即收入水平越高的青年女性越有可能存在生育性别结构理想与现实的偏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考察了现阶段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1)青年女性生育数量维度的偏离以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平均高出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孩子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经济—文化”类型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情况有显著影响,与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相比,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数量偏离的程度更大,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存在数量偏离的程度相对较小;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和低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偏离的概率高于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而高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在性别维度偏离的概率低于低人均GDP—弱生育文化区域。(3)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经济—文化”区域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重视生育支持政策的“经济—文

化”同向驱动。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更多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强力约束和生育文化的强大惯性叠加引发,因此,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配套措施,既要千方百计地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减轻生育负担;也要积极建构新型婚育文化,加大文化氛围营造和支持力度。(2)注重并引导国家层面对生育支持薄弱领域的政策倾斜。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不仅存在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也存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区域差异。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过程中,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地利用和发掘区域“经济—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有利于促进生育水平提升的区域“经济—文化”要素的作用,有效提振区域生育水平。(3)提升生育支持政策的区域联动。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在区域空间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生育支持政策既要凝练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地区促进育龄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现实生育行为的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也要鼓励和支持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取长补短、协调联动,降低“经济—文化”因素对生育率下行的传导作用,形成提升生育水平的全国一盘棋联动机制。

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本文还存在诸多可改进和提升的空间。首先,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不止体现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可能也存在生育时间维度的偏离。由于婚育年龄推迟导致育龄群体在生育时间选择上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增加了生育时间调查设计和准确获取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生育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和复杂性,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开展生育时间维度偏离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尽管本文发现“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也分析了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但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未能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经济—文化”区域作用机制展开分析,这有待日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最后,本文主要使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尽管能够勾勒出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在数量和性别维度各个指标的现状,却难以比较其偏离的纵向变化趋势,未来需要使用长时段的追踪调查数据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卫、靳永爱(2011):《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第2期。
2. 陈蓉(2023):《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3. 陈佳鞠(2021):《后生育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差异及其原因》,《人口研究》,第6期。
4. 龚顺等(2023):《当代中国青年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5期。
5. 顾宝昌等(2020):《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人口与经济》,第1期。
6. 侯佳伟等(2018):《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1979—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7. 贾志科等(2019):《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保定调查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第5期。

8. 罗志华等(2022):《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3期。
9. 乐茵、杨昕(2023):《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人口学刊》,第4期。
10. 刘卓、王学义(2021):《生育变迁:1949~2019年中国生育影响因素研究》,《西北人口》,第1期。
11. 茅倬彦、李宁(2023):《低生育率下我国生育健康的挑战与展望》,《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第1期。
12. 宋健、陈芳(2010):《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13. 田宏杰等(2022):《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青年探索》,第4期。
14. 王金营、戈艳霞(2013):《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人口研究》,第1期。
15. 王军、王广州(2016):《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人口学刊》,第2期。
16. 夏志强、杨再苹(2019):《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人口与发展》,第1期。
17. 薛珑等(2023):《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与生育率》,《统计与决策》,第15期。
18. 杨菊华(2022):《从“一个不少”到“三个正好”:中国生育政策的流变逻辑》,《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19. 於嘉(2022):《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20. 袁益、张力(2021):《生育机会成本及异质性——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发现》,《人口与经济》,第6期。
21. 翟振武等(2022):《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22. 张冲、李想(2020):《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中国卫生统计》,第6期。
23. 张银锋、侯佳伟(2016):《中国人口实际与理想的生育年龄:1994—2012》,《人口与发展》,第2期。
24. 张翠玲等(2019):《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二孩生育时机及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人口与发展》,第4期。
25. 赵伟锋等(2017):《成本收益失衡、学习演化与区域低生育水平强化》,《经济经纬》,第5期。
26. 郑真真等(2009):《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7. 庄亚儿等(2018):《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实践与思考》,《人口研究》,第4期。
28. Billari F.C.(2015), Integrating Macro- and Micro-level Approaches in the Explanation of Population Change. *Population Studies*. 69(S1):S11-S20.
29. Becker G.S.(1992), Fertility and the Econom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5(3):185-201.
30. Becker G.S., Barro R.J.(1988),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1):1-25.
31. Caldwell J.C.(1976),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4):321-366.
32. Fernández R., Fogli A.(2006), Fertility: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Fami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2-3):552-561.
33. Fernández R., Fogli A.(2009),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146-177.
34. Furuoka F.(2010), The Fertility-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from Threshold Regression Analysis. *Economics Bulletin*. 30(3):1808-1822.
35. Hagewen K.J., Morgan S.P.(2005), Intended and Ideal Family Siz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2002. *Popula-*

- 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3):507–527.
36. Kane D., Li K. (2023), Fertility Cultures and Childbearing Desire after the Two-Child Policy: Evidence from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9(2):576–594.
 37. Luci-Greulich A., Thévenon O. (2014), Does Economic Advancement 'Cause' a Re-increase in Fert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1960–2007).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0:187–221.
 38. Leibenstein H. (1975),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9(1):1–31.
 39.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211–251.
 40. Lee R. (2002),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ree Centuries of Fundament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4):167–190.
 41. Marcén M., Molina J.A., Morales M. (2018),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the Fertility Decisions of Immigr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Modelling*. 70:15–28.
 42. Van de Kaa D.J.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42(1):1–59.
 43. Van de Kaa D.J. (2001), Postmodern Fertility Preferences: From 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 to New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290–331.
 44. Zaidi B., Morgan S.P. (2017),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Review and Appraisa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473–492.

Regional Variations of the Fertility–Intention–and–Behavior Deviation among Chinese Young Women: Findings from th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s

Jia Zhike Luo Zhihu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viation of fertility behavior from fertility intention among Chinese young women, and it explores the geographic variations and its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explanations. We use data from the 2017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 and fi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young women surpass their actual fertility by an average of 0.4–0.5 births. Almost 60% of the young women have not achieved their desired or intended gender composition of births. Moreover, the deviation exhibits noticeable region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2) The regional "economic–cultural" typolog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desired and actual fertility. Young women in the regions with high GDP per capita and strong fertility cultures are more likely to observe deviations of fertility behavior from intention in terms of both quantity and gender composition. (3)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cross different economic–cultural region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considering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cultures and emphasizing cultural factors alongside vary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Efforts should aim for "economic–cultural" alignment and cohesive connection across regions to foster sustainable, balanced, and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Youth Women; Fertility Intention; Fertility Behavior; Deviation; Regional Variations

(责任编辑:李玉柱)